

俞鴻鈞的早年(下)

王紹齋

俞鴻鈞先生幼年即明敏勤學，十歲時隨從父親學習英語生字和零碎的句子，詞句大多是商場上的術語，特別是有關豬鬃生意的。他同時在一家私塾攻讀四書五經，學習詩詞歌賦，並練習書法，從小就養成了手不釋卷的習慣。雖不擅長運動，但他常手持鐵鍊在馬路上玩耍，以表示他在練功夫，避免遭到其他小孩的欺侮。

他的父親俞廷柱先生對他的好學聰穎，衷心歡慰！俞鴻鈞十四、五歲時他父親便常常帶他出去應酬，練習社交應對，他已學會吟詩作對，常常在與父執輩的宴會上，即席作對吟詩，深得父執輩的讚許，咸認此子非凡品。

好學樂羣崇敬革命

俞鴻鈞先生讀完小學後，進入上海民生中學就讀。此時他已是一翩翩少年了，好學樂羣，深得同學們的愛戴。放學回家後，還要幫助父親做生意，商行中事無巨細，他都參與，於是對於生意一道，頗有心得，舉凡貨物的優劣、成色、產地，一經觸手過目，無不立辨，但是他志不在此，仍然潛心於功課的閱讀。

俞鴻鈞先生十五歲時正是中華民國誕生，他憬悟着個人在民主政治的環境中競爭生存，必須努力充實學業。他的國學已稍有根基，因此他對外國語文特別是英文開始下苦功，他的父親也常加鼓勵，他爲了精進，時時放一本袖珍英文字典在衣袋中，無論何時何地，稍有餘暇，或遇有未能瞭解的字句，即隨手翻閱，故他在中學一年級時，已能閱讀英文報刊了。民國三年二月一日，上海聖約翰大學舉行冬季休業式，邀請國父孫中山先生在該校大會中發表演講，主席介紹時，尊孫中山先生爲國父。國父演講時指出：「今日言責任，聖經中云：已見光明，應爲人導，既有智識，必當授人。民主國家，教育爲本，人民愛學，無不樂承，先覺覺後，責無旁貸。以若所得，教若國人，幸勿自蔽其光」。中山先生在聖約翰大學演講的盛況，傳遍上海，給予智識青年很大的鼓舞。俞鴻鈞好學深思，對國父孫中正先生的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甚爲信服，對中山先生率領的革命黨百折不撓的精神深爲崇敬。

民國四年，俞先生自上海民生中學畢業，旋即考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該校係於民前三十

二年（光緒五年）九月一日由一位祖籍猶太生於歐洲立陶宛皈依基督教的施主教創辦，位於極約非而路，校地爲一廣場有八十四畝，距黃浦灘約五英里，園中樹木，剪裁甚好，並闢有馬路。該校筆路藍縷，慘淡經營，到一八八六年（光緒十二年）卜舛濟牧師來華主持校務，強調英文實爲傳播新教育的媒介，研究英文亦不致荒廢中國語文。他曾於一八八七年的報告中，歷數英文的利盆：一、華人研究英文，猶如西人研究拉丁文，可以增進智慧。二、研究英文，可以鑿除華人排外的成見。三、華人研究英文，可以增進東西間的情感，並可以擴張國際貿易。四、研究英文可以使華人明瞭基督教事業在培養人才，爲社會服務。因此聖約翰大學教授英文，極爲認真。國人學英語，多有缺點，一經聖大陶鎔，無不讀音準確。俞鴻鈞先生在中學時，對英文已略具基礎，但他進入聖約翰大學一年級時，便深深感到英文程度還很淺薄，於是他專心苦攻英國語文。爲求精進，將衣袋中的袖珍英漢字典隨時翻閱，無論何時何地，見到有英文書報刊物，就是包糖果舊英文報紙，亦細心加以閱讀。一有餘暇，甚至在漱洗時或獨

自散步時，便開聲朗讀。大學二年級時，他的英國語文便脫穎而出，升三年級後，他的英文已有相當造詣，聖約翰大學三、四年級考試，採用榮譽制度，他名列前茅，曾多次獲得聖約翰舉辦的中文譯英文及英文譯中文的譯文比賽第一名。同時，並擔任了該校傳統的「約翰聲」報的總編輯。他在校時與俞大維為同班同學，他倆中英文俱佳，每次校中英文翻譯比賽，他與俞大維穩居第一二名，如本年他中文譯英文或英文譯中文得第一名，俞大維即得第二名；次年中文譯英文或英文譯中文俞大維得第一名，他即得第二名，他們每年第一二名互換，一時傳為校中美談。

運動健將受益成才

俞鴻鈞先生在學生生活頗有趣，當年聖大的宿舍是在恩孟堂，恩孟堂為三層樓建築，屋頂的四角作曲線形，保持中國房屋的特質，甚為美觀。內可住學生九十六人，一年級生住樓下，四人一房；二年級生住二樓，三人一房；三年級及四年級生住三樓，兩人一房。俞鴻鈞先生升二年級時，由樓下遷上二樓，同房的兩位同學，一位是由墨西哥回國的黃姓僑生，另一位是馮建維，為當時該校的足球健將，非常活躍。俞鴻鈞先生與馮建維遷入時便和馮打趣說：「糟了！我和波牛（廣東話意思是足球健將）住在一起，如何得了。」然後一起哈哈大笑。他們是同鄉，又是同班同學，而今又同寢室，他們畢業後，曾同在上海青年會教英文。當時他們兩人唯一不同之點，一個是拼命讀書，一個是拼命運動。一般學生下課後

多在宿舍房間預備功課，或游談笑樂，俞先生則在每天下課後便往圖書館苦讀。馮建維受他感染，每天下課練完球後，也就和他一起往圖書館勤讀，三年下來，變成文武雙全的學士。馮建維聖大畢業後赴美深造，在賓州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回國獻身教育，教授英文，桃李滿天下。馮建維追憶與俞先生在大學三載同室的往事，非常感動的表示：「我能由球壇的波牛變為教壇的教授，是受俞鴻鈞的影響，使我畢生感銘。」馮建維對青年學生時代的俞鴻鈞的印象是：文雅整潔、外圓內方、生活嚴謹、不抽煙、不飲酒、有定見、機智、勤奮。

愛馬騎馬騎術高明

俞先生初入校時，只知專心用功讀書，功課雖好，但同學對他却不友善。而他的一位要好的同學蘇尚齊君，功課並不好，同學們對他都很好。因此他時加反省，除用功外，並注意同學間的情感交流，此後同學們對他態度始大為改善。聖約翰大學提倡新教育，對於體育非常注重，惟早年學生每不喜脫去長袍，從事運動，因此採用強迫制度，規定運動時間，兵式體操，成為約大的一項傳統。每年畢業日，全體學生排隊操演，雄糾糾氣昂昂，博得來賓的稱譽。俞先生在體育場上並不出風頭，他愛上了騎馬，嚴家淦先生和他為約大同學，嚴家淦憶念俞鴻鈞這位老同學時曾談到他生前的嗜好，他說：「俞先生最喜歡騎馬，不但喜歡騎馬，而且騎術極為高明。他騎馬已有很久歷史，戰前就開始騎，他騎起馬來

像個武士。在南京和上海，他常常騎馬，到了臺灣後也曾騎過幾次，但沒有好馬，所以後來就不騎了。」俞鴻鈞的愛馬，西方有一句話「愛馬的人格是善良的」。俞鴻鈞騎馬還有一個秘密，鮮有外人知道的：那就是他的公文包內經常帶着「馬蹄鐵」一個。它的來源是：俞鴻鈞在上海騎馬時有一次馬失前蹄，以致馬腿折斷。照馬場規定：馬腳折斷後因無法站立，只得將馬處死，以減少牠的痛苦，俞先生因此對此馬有情感，故經常保持馬蹄鐵，以示不忘，以此足證他重情誼之一斑。此馬蹄鐵現仍由俞先生的家人保存中。

深切體會物力維艱

他父親有一次在進餐時對他的英文作過一次「突擊考試」。適在席中輕描淡寫的問他：「鹹魚豆腐湯」應該如何翻為英文？這一下却將俞先生難倒了。雖然他很快翻譯出來，但他承認非常勉強。他對他父親說：「外國人沒有這道菜式，所以從未學過，只有勉強翻譯出來」。俞廷柱老先生對於這個長子的才智超人，連聲用廣東話說：「不錯！不錯！」。他在聖大三年級時，他的父親廷柱老先生逝世，俞老先生彌留前曾召他至病榻旁叮囑：「外行的生意不要做，內行的生意沒有實權不要做。每一個錢敲開來看都有一滴汗一滴淚」。這位老先生雖然以一名生意人說些自己親身的經驗話，對於從事任何行業來說，這看似簡單的幾句話却是不易的真理。俞鴻鈞先生銘記心頭，常以此遺言與友好及同儕共勉。他深深體會最後一句，是因為他父親一生辛勞奮鬥，雖然賺了很多錢

，但都能深切體會物力維艱得來不易。

俞老先生逝世後，雖沒有遺留下太多的財物，却有一件事想得很週到：他生前曾娶有一位侍妾，此為過去廣東人一般習俗，他在未死之前，已為這位侍妾在蘇州購得寺院一座，他逝世後，這位侍妾即赴蘇州出家修道，不遺留絲毫資費于子孫，此種作風，堪稱一絕，因此可見俞老先生實在非常的特別，待人治事有他獨特的作風。

爾後俞鴻鈞的這位庶母逝世，他曾親往料理後事，並將所有廟產贈與庶母的徒弟繼續主持。

從不炫耀法律學問

俞老先生的仙逝，給予俞鴻鈞心理上一個極大打擊，而且挑起了整個家庭的擔子。他是長子，要對一個弟弟、四個妹妹負起教養的責任，同時還要幫助他的叔叔俞星耀照應其父遺留下來的豬鬃生意，因而染上了氣喘病。俞鴻鈞天生有一個權衡輕重緩急的頭腦，處事有條有理。他在本身學業的重壓下，每當週末假日自校返家，總抽出時間來檢查弟妹的課業，看到不對的地方，總是耐心的替他們改正，手足情深。他常代他的妹妹作文，時被她的老師選為佳作，貼堂示範。足見俞先生青年時對國文已頗有根基。

俞先生後來在教學之餘，曾參加美國芝加哥的法律函授學校，並獲得證書及學位，具有擔任上海英法租界法院認可的律師資格。但他從不炫耀他對法律方面的學問，亦未擔任過律師職務。但他因而養成了崇法務實的精神，這對他畢生能青雲直上，對社會和國家的影響是無可比擬

的。

大妹作伐娶得佳偶

聖約翰大學的北面為聖瑪利亞女子書院，兩校之間，只隔一高牆。當時風氣未開，男女兩校學生同在禮拜堂做禮拜時，女生席旁用簾掩隔，但排隊入教堂時，往往相遇，且簾隙窺人，自然難免，兩方相晤，如新娘遇新郎，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男生平日不得進入女校之門，男生視聖瑪利亞女子書院宛如紫禁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人之常情，男女兩校雖有一牆之隔，視若長城，然戀愛結婚好事頻傳。俞鴻鈞先生與梁就光小姐就是其中一對佳偶。他們兩人的結識，開始是由他的大妹妙貞小姐介紹的。

俞先生為聖約翰高才生，梁就光小姐是聖瑪利亞女子書院的才女，嫻中西文學，尤善草草，秀勁高雅。梁就光小姐本籍廣東省臺山縣沙崗墟，幼從比利時牧師畢力克博士在廣州市河南聖公會讀書，後來到上海深造。俞先生少年英俊，梁就光淑美莊麗，才而有德，在學校有「活觀音」的雅號，男才女貌，真是一對佳偶。

他們在未結婚之前，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梁小姐有一次她母親在廣州寄來的錢，準備購書的，被扒手竊去，如再去信廣州，已來不及於是急得不得了。事為俞先生所知，立刻將所需的錢請梁小姐要好同學梁少寬的弟弟交其姊轉交給梁小姐，不料小弟竟將此款交與校長轉交，該校校長是一個修女，而且是老處女，對於男女生交往，認為大逆不道，有損校譽，即將此款交與聖大

校長卜舫濟牧師，意思是要卜校長對俞先生予以違反校規處分。卜校長叫俞先生到校長室問話，俞先生知事情不妙，但他情急智生，立刻回答卜校長說：我和梁小姐將要結婚了，有何不可？卜校長因此不但未予處分，反而祝福他倆幸福。因此亦促成俞先生與梁小姐的婚姻早日完成。

民國八年，俞先生在聖約翰大學畢業，他踏入社會第一件大事，就是與梁就光小姐結婚；當時證婚人即係卜舫濟校長。他倆琴瑟和諧，同甘共苦，四十年如一日，先後生了三位女公子，長女筱鈞適繆啓威，次女筱梅適李福泰，三女筱璉適李其昌，是一個典型的基督教徒家庭。

留校任教兼職記者

俞先生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因成績優異，被聘留校擔任助教及在中學部教課。這時他父親遺下的商業，由他的叔父俞星耀先生掌理。俞星耀有子早卒，極思俞鴻鈞先生能繼承其業，但知其志，乃決心讓他獨立發展其抱負。每月給他生活費一百元，他除了要負擔家庭開支外，尚須負擔弟妹學雜費等，他從不嫌少，只有自己努力找工作，增加收入。所以他在青年會兼教英文，並由上海「字林西報」記者李才先生介紹，經常以英文投稿該報，從此便與新聞界結緣，並對新聞工作發生濃烈興趣。往後他的叔父俞星耀先生經營豬鬃生意失敗，財產損失甚鉅，反而時常要他接濟，俞鴻鈞先生盡力供應，毫無怨言。

民國八年中國國民黨為了增進國際宣傳，在上海支助陳友仁創辦英文「大陸晚報」。俞先生

經常向該報投稿，陳友仁對他的英文造詣甚為賞識。有一天，陳友仁約他晤談，見他一表人才，問他有沒有興趣做記者，他一口答應了。陳友仁自幼生長在國外，英文蜚聲國際，惟性情偏急，對人不假詞色，報社同事將稿送給他閱判時，稍不合意，即擲於地。但他對俞先生撰寫的稿件，却從未拋入字紙簍，有不對的地方，總是耐心替他改正，數月以後，俞先生英文日益精進，所改漸少，甚至一字不易，最後他囑不必再行送閱，逕行付印。

俞先生初入報館任職時，每月薪津只一百元，家中不夠開支，旋與夫人商量，由其夫人親向陳友仁陳情，於是陳友仁立即將其薪津增加為三百元，後來他的家境寬裕，實內助之功也。

他任記者係初出茅廬，人又忠實，碰了不少釘子，但他始終不忘這為時三年的記者生涯，他常對人言：「我過去三十多年對國家服務的歷程中，使我最留戀的是我初入社會的三年記者生活，而使我獲益最多的也是那三年的緊張的工作。最初我當英文編輯時，我的中國文字受到最嚴格的考驗，使我對英文寫作，能有一點根基。」俞先生三年的記者生涯，對他為人處世也發生了極大的作用，他曾說：「我爲了從事法院審訊案件的處理，在六個月中，學會了英文速記。爲了怕漏掉新聞，我必須每天預定的事項，列入紀錄，每天晚間把做過的事情，逐一檢討，再把明天應做的事，逐一檢點，分別緩急。我養成了這種習慣後，一直保持不變，給我後來服務國家社會的各項工作中，能有所貢獻。」同時亦增加了

他的人生閱歷，得知如何從複雜的人生中，去尋求真理。又由於工作的需要，養成了機智的應付、堅強的忍耐、審慎的判斷與負責的態度。他以記者從政後，對記者特別親切優待；因此陳友仁對他有了相當的認識。

與國民黨建立關係

那時，中國國民黨總部設於上海環龍路四十四號，老友周雍能在黨部當幹事，因爲近水樓臺的關係，彼此交往更加密切。俞先生與國民黨的道義關係也在這段時間建立起來。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廣州，發表宣言，揭櫫三民主義與革命政綱，風聲所播，全國有志青年與覺悟民衆，均奔集國民黨革命旗幟之下，不旋踵而北伐成功，此一宣言號召力與影響力之大，在中國革命歷史文獻中，幾無出其右。當時係由俞先生將大會宣言譯爲英文，廣泛介紹於國際人士，而國際人士亦由此對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國民革命，獲得進一步的認識。

開始從政預見敵友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克復武漢，陳友仁出任外交部長，邀請俞先生在外交部擔任陳的英文秘書，這正是俞先生一生從政的開始，他當時係單獨前往漢口就職，首次與愛妻和愛女分離。陳部長對他信任有加，部長的私章交其掌管。凡所經辦的事，莫不銳意逕行。當時武漢的局勢非常混亂，俄共鮑羅廷及中共等竟利用國民政府暨中央黨部擁擠挪鄂的空檔，擅在武漢宣佈成

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暨國民政府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以徐謙爲主席，正式通告：「在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未在那開會以前，執行最高職權。」此一機構，於法於理均乏根據，亦即釀成寧漢分裂的始作俑者。當時國民黨中的共黨份子及左派人物，均在鮑羅廷的指揮之下，發動所謂「提高黨權」運動，主要的陰謀在於「反對蔣總司令」，挾持三中全會，取消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並削弱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統帥權，目的爲推翻國民黨領導中心，代之以共黨與左派聯合組織的武漢政府。同時倡呼所謂「三大政策」——聯俄、聯共、工農政策，代替國父所昭示的三民主義的理想，又在武漢竭力從事煽動農工暴動，終日開會遊行，以致造成社會的恐怖，商店多數關閉，員工多被征調去開會，如果店東干涉，即被捉去遊街。

陳友仁部長係廣東人，生長在國外，對國內情勢了解不清，而且不懂中國文字，對中國固有文化和背景殊屬茫然，況他的思想左傾，而他的左右的人士又多屬共黨，俞先生處身其中，目睹當時形勢，獨力殊難支持，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於是毅然辭職，立即由漢口乘輪返回上海。

俞先生雖在外交部任職不久，但對於當時武漢及九江租界的收回及一切外交上的措施，均有卓越的貢獻，從此亦引起了他一生對於辦理外交的興趣。不久國民革命軍克復京滬，寧漢分裂，旋因蔣中正總司令的堅決反共，實行全面清黨，共黨一切作爲全國國民所共棄，共黨所把持的武漢政府終於垮臺，足見俞先生早有遠見。